

民国时期的土匪

Bandits
in Republican China

(修订版)



「英」贝思飞 著

徐有威 等译

卜文 等校

民国时期的土匪

Bandits
in Republican China

(修订版)

[英] 贝思飞 著
徐有威 等译
卜文 等校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时期的土匪/(英)贝思飞(Billingsley, P.)
著;徐有威等译. —2 版(修订本). —上海: 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10

书名原文: Bandits in Republican China
ISBN 978-7-208-09451-2

I. ①民... II. ①贝... ②徐... III. ①土匪—研究—
中国—民国 IV. ①D693.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1132 号

责任编辑 金绮寅
封面装帧 王小阳

BANDITS
in Republican China
by Phil Billingsle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民国时期的土匪
(修订版)

[英]贝思飞 著
徐有威 等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5.75 插页 5 字数 352,000
2010 年 9 月第 2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250

ISBN 978-7-208-09451-2/K·1700

定价 46.00 元



图1 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一张宣传漫画，描绘了一个肥胖的中国人，由于腹部的肿大而无法行走。腹部的“匪”字与“肥”同音。这幅漫画反映了日本人的看法，内地省份长期的土匪出没是庞大的中华民国的必然结果，它暗示了日本并吞中国的企图。选自《中国名物匪贼物语》（东京，1931年）。



图2 一份官方的军印说明一个匪首被正规军招募，这是颁发给福建护国军支队的官印。选自安得思《在中国的野营和足迹》(纽约和伦敦，1918年)。



图3 两位东北地区匪首。其中一位后来成为张作霖的上校。选自麦凯《落入中国匪窝》。



图4 “白狼过秦川”，一位当地艺术家所创作的表示同情的当代木刻，描述了1914年4月白朗进攻陕西凤县的情景。上面部分在“白元帅”旗下的是白朗本人，他正在指挥骑兵攻城。下面部分是等待攻城信号的步兵。选自王树村《关于白朗过秦川的一幅版画》，《文物》1964年10月。



图5 一位东北匪酋，这是他被捕之后拍摄的照片。(1922年11月2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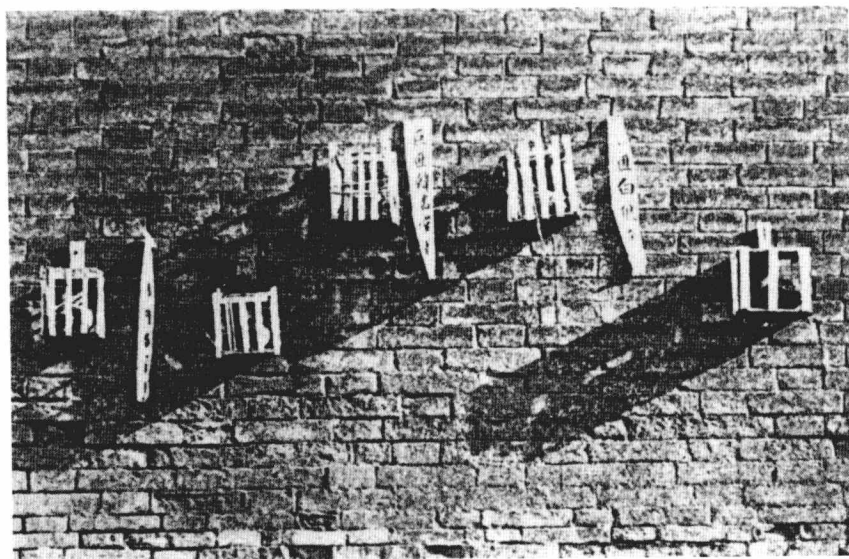


图6 白朗和他的几位追随者的头颅被装在木枕里悬挂在开封南门的城墙上。根据告示，右起第二个木枕装着白朗的头颅。选自威廉·怀特《华裔犹太人》(纽约，1966年)。



图7 由云南土匪颁发的一面令旗，持令旗者说明已经得到许可通过土匪控制的地区。选自洛克《一位孤身地理学家的经历》。

中译本修订版前言

我为《民国时期的土匪》的中文版的初版撰写前言距今似乎只有短短数年,事实上却已 18 年有余。非常感谢徐有威教授,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此书的初版于 1992 年得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对此书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出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此时此刻中国学者的研究受到某些约束。不但对外国学者而言无法出于研究目的而造访中国,而且中国研究人员也几无机会进行有关民国时期的土匪或其他具有独创性的研究。由于没有机会接触深藏在中国众多的档案馆内丰富多彩的地下宝藏般的资料,我的这一研究完全是在英国和日本的图书馆里进行的,使得此书出版时极像那个年代的产物。

然而,正如余子道教授在他所写的此书的中译本初版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此书填补了在中国史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也令人尴尬的空白。这本书出版后,由于政治环境的充分改善,中国学者得以出版一度被禁止的以土匪为研究主体的独立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中国学者翻译出版国外的著作,比出版自己原创的著作要“安全”一些),当这一切发生时,其情形犹如打开了一道闸门。

据汪远忠和池子华两位先生在 1998 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1988—1998 年间,在中国近代土匪方面共出版了 3 本著作,5 本资料集和 30 多篇论文。^[1] 2009 年 2 月徐有威教授所做的另外一项研究显示,文章的数量上升到约 150 篇,以及 32 部论著(包括译著和通俗读物等)。截至 2002 年,中国大陆各地大学有 16 位学生不约而同地先后提交有关近代中国土匪问题的学位论文,因此获得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2] 余子道教授对中国学者应该在中国近代史的这一关键领域给予更多关注的劝勉终于得到了注意。

中国土匪研究的现状,正如在我和徐有威教授发表于2002年10月出版的《近代中国》(Modern China) [3] 的文章中所指出的,18年来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中国学者还是冒险涉足了许多与土匪研究相近的领域:帮派组织、帮派成员的起源、政治纽带、经济因素、土匪的日常生活——甚至是原先被禁止的土匪与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相联系的话题都有了一定的研究。

21世纪初土匪研究进入低迷期很可能是由以下多种因素所造成的结果:学者中弥漫着已用尽了所有研究土匪途径的想法;中国自身条件的变化:由车匪路霸事件造成的恐慌,这一事件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激起了出版社对于土匪问题的热情。因此民国时期土匪的研究积累了相当多的资料,未来的学者们可以使用这些资料把“土匪的研究”提高到更高的层次。我相信中译本初版的出版对土匪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这一修订版的出版会起到更好的推进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即上文中所提到的政治解冻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成为中国学术界最受欢迎的改变之一,它就是中外学者开始了密切的联系(包括和中国台湾同行之间的联系)。事实上,徐有威教授当年决定翻译我的书就是这一新事态的第一批成果之一。而我们之间从1988年开始的合作研究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通过中国对国外思想开放所产生的国际研究项目的范例。迄今为止,我们的合作完成了11篇英语论文分别在日本、美国和英国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其中10篇涉及土匪),还有大量的中文文章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出版。在这些中英文文章中,一部分在中国和日本曾经被多次转载。与此同时,我们还合编出版了两本记录民国时期被土匪绑架的外国人的回忆录,先后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出版。

自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以来,另一可喜的发展在于中国大学中选择把焦点放在民国时期土匪上的博士生和硕士研究生数量的增长。更具象征性变化的是:他们的研究无论是聚焦于他们家乡的土匪,还是所读研究生的大学所在的省份的土匪,都得到了首肯,有时还能够得到地方政府出于填补地方史研究空白的研究经费的支持。过去地方官员羞于提及历

史上出没本地的土匪,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开始支持研究这段历史了。

尽管取得了这一进展,但是中国土匪研究中还有不少值得深入的领域,其中一个被忽视的领域即将土匪作为人的研究,以及将匪帮作为一种社会群体来进行有效的研究。虽然我曾经专门设立一章节来考察土匪的日常生活,以及使许多土匪成为精神病患者的不可想象的压力,但是这种领先并没有得到中国学者的进一步研究。不过,据悉有一位上海的硕士研究生已经注意到了土匪的精神世界这一研究领域,这确实是令人可喜的现象。

期待学者引起注意的另一个领域是在 1949 年前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期间和土匪的关系。通过王全营和邵雍两位先生的研究 [4],我们知道了更多我在写英文原著时所不知道的知识。但他们仍然过多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剿匪战术,对中国共产党被迫与土匪结成的亲密关系的关注还是太少了。

例如在江西苏区时期,红军被迫依靠当地土匪的人力和后勤知识,有时出于现金和粮食的需要,他们也不得不表现的像土匪一样。直到最近,这个严格保密的资料才开始浮出水面。有新资料表明,甚至是在后来的陕甘宁边区时期,尽管政府精心地制造出那些年共产主义理想体现的画面,但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对土匪和其他非正规军的依赖远远超过如今我们所想象的。系统的研究尚未进行,但我希望不久的将来一些有进取心的中国学者将主动打破(或至少倾向于)这些禁忌。

最后,我想就上海人民出版社同意出版徐教授的中译本修订版说几句感激之语。尽管有迹象表明,民国时期的土匪不再如十年前一样是“热门话题”,但是这一中译本修订版的面世也证明了在中国,人们对民国时期下层社会的兴趣依然强劲。我将会非常乐意见到年轻的一代能受到此书的鼓舞,去重新思考在暴力变革阵痛中被不平等社会抛弃的人间戏剧。如果其中有些被鼓励作为社会史研究者加以关注,我将会感到更加的高兴。

民国时代的中国充满着混乱和悲剧,但是民国时期土匪的研究却将成为投射在这段历史上的明灯。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一次犯罪学的演练,也不能仅仅看作是对男性神秘感的研究。尽管土匪研究包含所有的这些东西,但是归根到底是人类在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面前处境的研究。从这个意义来讲,虽然只是碰巧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作为本书的焦点,但是它却解决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这或许就可以解释此书在初版后会受到如此多中国读者欢迎的原因了。我期待这一中译本修订版的出版将同样受到读者的青睐。

贝思飞
2009年11月

注 释:

[1] 汪远忠、池子华:《中国近代土匪史研究述评》,《学术界》(合肥)1998年第2期,第57—63页。

[2] 徐有威:《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以民国时期的土匪为例》,提交由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地域研究推进事业(NIHU Program)主办:当代中国区域研究第2届国际研讨会——“验证:改革开放30年”,东京早稻田大学,2009年2月7—8日。

[3] Xu Youwei and Philip Billingsley, “Out of the Closet: China’s Historians ‘Discover’ Republican-Period Bandits.” *Modern China* 28:4(October, 2002):467—499.

[4] 王全营:《试论中国共产党对“土匪”工作的策略》,《商丘师范学院学报》(河南)1988年第4期,第8—16页;邵雍:《民国绿林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中译本前言

徐有威等先生将我的著作《民国时期的土匪》译成中文，对此我深感荣幸。然而同时，我也深感惶恐，因为我对中国现代史中的土匪问题提出了一些想法，这些想法还有待广大中国读者的审读惠正，再说这本书毕竟是在英国和日本的图书馆中撰写的。

我的这项研究工作始于1969年，那时我正在英国里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博士生导师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问题专家、已故的拉铁摩尔教授。正是这位拉铁摩尔教授，他不仅帮助我意识到中国土匪的无所不在，特别是沿着“亚洲腹地的边缘地区”，而且他帮助我认识到土匪的生活方式，这与权威道学家的批评相比，显然远为意味深长。

20世纪60年代末，在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的治史态度，许多年轻的学者开始反对传统的史学家仅仅留意大人物的做法，他们提出历史学家主要应该关心普通民众，因为正是他们构成了人口的绝大部分。我对中国土匪的研究，就是在这种寻求新的民众史的时代精神中开始的。

20世纪60年代还有一场运动风起云涌，那就是越南人民的抗美卫国斗争。我相信，寻求新史学和反战运动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不言而喻的。年轻人为越南人民的行动所激励，他们怀疑现状，开始寻找审视世界的新方法。而寻求新史学就是越南战争所激起的政治运动在学术研究中的反映。

换言之，那是非常浪漫的时代（人们自我感觉有能力扭转乾坤），随后又出现了一股极浪漫的思潮，不仅对于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而且在那一时期进而研究所有的起义和造反。我承认，我对土匪的研究也不例外。

1974年我获得博士学位，不久就来到日本工作。1979年以前我一直没有专心研究土匪，那一年有人提议我可以准备出版研究成果。至此，距

我起步研究已有整整十年,当然我的见解已相当不同了。

作为对 20 世纪 60 年代浪漫思潮的反应,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人们变得相当的注意实际和自我反省。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推进,男人们也被迫重新审视自己。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男人都承认,在 20 世纪 60 年代,我们只关心重大事件,对自己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不加留意。历史研究也是如此,此刻开始从研究“英雄造反”的丰功伟绩,转向审视以往对革命运动和造反起义的思考方法。在妇女运动的影响下,对“男性”思考方式的批评蜂起。这种“男性”思考方式对群众运动过度热衷,而对个人行为则颇为冷漠。当时,对尚未启迪民智就推翻了国家政权的革命进行批评的风气颇为盛行。因为这些革命者常常建立起像他们前辈一样的保守政权,或者比他们的前辈还糟糕。西方的这一反思时期,正好是我打算修改此书付梓之机,于是,我开始更关注那些作为个体的土匪,特别是作为个体的男人。

妇女运动的另一后果是,男人们开始比以前更加关心日常琐事。虽说“放弃浪漫空想”并没有强烈地影响所有的男人,但我本人却深受影响,因为我同情妇女运动。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已是两个幼儿的爸爸。作为“获得新生的”男人,我决心不仿效过去那些一心扑在自己研究中的男性学者,将自己锁在书斋中,把家务和育儿之事全推给太太。因此,我在撰写《民国时期的土匪》时,往往一只脚在书斋中,一只脚在厨房里;打字时每只膝头盘踞着一位小宝宝;每隔数小时就要停下来烧饭、换尿布,等等。结果,我用了十年功夫才写完这本书;如果我像大多数学者那样埋头苦干,那么这本书只要五年就能写成。另一方面,我想这本书也反映了我作为一个男人自我意识的增强,这是看管孩子、操持家务所带来的。但我相信,这本书的内容本身要比它的主题更为有趣。关于这点,我想我的中国读者自能明鉴。

除了像白朗那样发展成重大起义的匪帮之外,中国的学术界对土匪几乎很少关注。1949 年以前,土匪通常被当作邪恶的东西而遭冷落,除了耸人听闻的言词之外,几乎少有记载。1949 年以来,土匪不再成为时

事问题,道德评判也为政治评判所代替。因为土匪是“原始的革命者”,他们被认为没有在“现代”革命中发挥作用。由于土匪的政治立场难以界定,因此,学者们感到很难将他们划分为革命者或反革命者,“好的”或“坏的”。1949年以来对土匪问题研究的受挫,我想这点是很主要的。然而,在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一种新气象,他们不再带着“男性偏见”只关心历史竞争中的成功者,他们也开始平等地注意失败者,以及那些对“正统”社会不适应的人们。我希望中国新的学术气氛能够激励研究者们努力赶上并超过西方学术界变化着的学术目标,既注意研究运动,又关注个体;既研究成功者,也不放弃失败者。我相信每个个体,他或她的所言所行,都应该得到公正严肃地对待。这一思想始终贯穿于我的这本书,我希望它能勉励中国读者同样思索这个问题。

虽然土匪在中国历史编纂学中常被视为“坏分子”,但这本书想说明的是,土匪活动往往是他们面临险恶环境所作出的一种合理反应,恰恰是那些“可敬的人们”逼迫这些“坏分子”为匪的。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把土匪放入历史长河进行考察,他们反抗独裁统治的传统源远流长,从盗跖时代直到现代,他们常被统治当局污蔑为“反社会者”、“危险分子”等等。虽然我已不再将土匪浪漫化,虽然我还指出了土匪既创造英雄业绩,又干出丑陋勾当,但是我希望中国读者会赞同这一看法: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对中国人民永恒的生命力的一种敬奉,而不是对中国社会“黑暗地区”的批评。

我愿再次表示,我深感惶恐向中国读者奉献我的这本书,而且迫切地期待着他们的评头论足。如果这本书能够对中国学者深入某些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充分涉及的领域有所帮助,那么我将感到无比欣慰;如果它能鼓励中国学者对社会底层的造反者和不适应环境者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详尽的研究,那么我会更加感到自豪。我对徐有威等先生的翻译再次表示感谢,同时对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中译本表示感谢。

贝思飞

民国史研究中一个有意义的新课题(代序)

余子道

英国学者贝思飞教授的著作《民国时期的土匪》，被西方学者推许为“民国土匪活动第一部综合研究专著”。在它问世两年以后，经徐有威等同志译成中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毫无疑问，贝思飞这一专著的中译本与中国同行们和广大读者见面，将会有力地促进这一课题的研究工作的发展。

研究民国时期的土匪，这在中华民国史中还是一个新兴的课题，是很值得史学界重视的。众所周知，土匪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差不多在世界各国都是存在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也不是在民国时期才有土匪，而是古已有之。但是，民国时期的土匪以其人数之众多、影响之广大、分布之普遍、组织程度和武装水准之高，却为其他时代所未有，而且它的存在和发展又同民国相始终。这一切都成为一种颇为特殊的社会现象。这是清末民初以来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危机的严重化程度。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我国对民国土匪的历史有过不少记载，但史学界对此却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写出一本较为系统、完整的专著。根据《中国历史学年鉴》(1982年版和1983年版)公布的《1912~1948年中国历史书目》，在民国时期的30多年中，从未有一本土匪史问世。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界比较注重于中国革命史、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对土匪一类下层社会和社会病态现象的研究，尚未引起重视，以致在这一领域中几乎形成一片空白。虽然近几年来，中国近代会党史的研究呈现出相当活跃的景象，其中对土匪历史也有所涉及，但以土匪历史作为一个正式课题，至今尚少有人涉猎。正如英国学者格雷厄姆·哈钦斯所指出的，“研究民国史的历史学家们传统上将注意力集中在众多的军阀个人经历、共产主

义运动以及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行为上,与此相反,土匪现象显然受到冷遇。”*这种状况,中外史学界有相似之处。西方史学界在早期也只是注重研究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以后才注意于对经济史和文化史的研究,然后又把视线转移到下层社会的历史,一步一步地深入社会的各个领域。贝思飞对民国时期土匪问题的研究,被西方史学界称道为“出色地矫正了这种不平衡”。虽然他对这一课题的探索,还不能说是对“20世纪前30年中国的土匪世界和土匪现象最终的详细分析”,正如作者自己也认为的那样,他只“希望这本书能为概括中国土匪问题打下一个基础”。但是应当肯定,作者做了一件极有价值的基础性工作,为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作出了贡献。

民国时期土匪研究的主要任务,在于揭示土匪这一社会群体在民国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探索这一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规律,使人们科学地认识这种社会病态和社会弊端以及消除这一现象的正确方向。人们可以出于不同的动机和愿望,采取种种不同的观点和方法,去审视土匪问题,从而引出许多不同的结论。然而,历史学家是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任务和职责的,他们可以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诸种方法,对土匪这一社会现象作出理论的说明和历史的描述,使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一个科学的认识,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土匪历史的研究,对于拓展民国史学科研究的领域是有意义的。无可否认,民国时期的土匪是民国史上客观存在的、对于社会各方面有广大影响的一个特殊的社会实体,它具有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组织形态,特有的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独特的思想观念和语言——黑话。诚然,土匪及其活动是属于社会下层,是社会病态的一种表现。但是,社会历史是一个整体发展的过程,历史的发展变化是由各种力量造成的。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积极因素与消极因

* 《亚洲事务》(1989年12月出版)。

素,都在历史进程中表现了各自的作用,各种力量相互形成一种合力,历史按照合力的方面发展变化。在这历史的诸种力量中,不可忽视的是社会下层的活动,历史的前进、停滞或倒退,其中都体现了它们的作用。长期以来,史学工作中忽视了对社会下层的研究,把社会下层历史的许多重要课题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这是不够全面的。对民国土匪的研究,是民国史中侧重于向社会下层和社会病态的层面所进行的探索,对于开拓民国史领域,从多方面揭示民国社会的本来面貌,更全面地说明民国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具有积极的作用。

土匪历史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和丰富民国社会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的研究。对民国时期土匪历史的研究,会广泛地涉及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土匪历史研究当然不以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等等的研究对象为研究对象,然后它广泛地涉及后者的内容,它同后者各部类历史的研究有着不少交叉的内容。例如,我们要深入研究民国时期的军事史,尤其是战争史和军队史,就需要研究土匪的历史。民国军队中,有相当一部分军事长官是从匪帮首领起家的,或者曾经充当过土匪头子。军阀军队的兵员来源,相当大的部分来自土匪队伍。形形色色的反动军队中,有不少时而为兵,时而为匪,甚至兵匪相通、兵匪一家。军阀战争、反动政府对革命军队的“围剿”战争、帝国主义侵华战争,都利用过匪帮,有的规模还很大。凡此种种,已成为民国军事活动的重要特征。因此,研究民国土匪历史,有助于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民国的军事史。同样,研究北洋军阀、西南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研究伪满政权、伪蒙政权和汪伪政权的历史,也都离不开对土匪的研究。更不用说,对土匪这一社会现象的研究,对于深入审察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内在矛盾,剖析其深层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揭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必然崩溃的趋势,有着更深远的意义。马克思曾经说过:“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马志尼和拿破仑》,《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50页)对土匪历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到半封